

丛 ■ 书 ■ 前 ■ 言

“社会理论译丛”是一套旨在向读者译介国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进展的系列丛书。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重要著述的翻译,能丰厚我们的理论积累,从纵深上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增强我们的社会想象力和理论反思能力,以利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

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质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故当代许多社会思想家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舍尔等人,从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是冠名为“社会理论”,其意在于强调,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脱离对构成人类行为之背景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赖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也是它的条件和限制,二者同样不可须臾或缺。而在我们现行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由于历史和现时诸种因素的制约,无论社会哲学抑或社会学理论都是相对发展缓慢,迄今仍属薄弱的环节。这与处在转型中的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大幅加快、社会结构急速变迁的形势很不协调。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社会理论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变化,才能适应 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环境,解决由此带来的种种冲击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哲学研究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狭窄的概念框架内,这里且不论这种沿袭斯大林式的做法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一分为三——作为它的自然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外推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亦即辩证逻辑——在学理上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仅从实践后果上,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为孤零零的几条原理,成为学生们死记硬背用于应试时的干巴巴教条的做法,就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完全相背离,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再来看看社会学。众所周知,社会学自 20 年代末从中国大地上破土复出后,迄今已走过 80 年的历程。当我们回首这一过程时,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学在学科知识普及、专门人才的培养、分支学科的涌现、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 20 年代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会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令人忧心的危机。事实上,社会学从获准恢复研究之日起,就带有它定位上的某种残缺。例如“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剩余科学”等观点,尽管出于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的曲折经历而在复出伊始刻意凸显其经验研究性格,意欲摆脱哲学干预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得到根本的弥补。结果就造成应用研究大多未脱离社会调查统计的层次,理论研究却亦步亦趋地甘当这种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究其根本,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上抱残守阙。社会学如果缺乏了社会理论的

想象和反思,必然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不仅就像一个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分工体系中立定自己的脚跟,而且势必会失却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卢曼直至布迪厄和福柯等一代代社会思想大师们所烹调出来的社会学味道。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也由于实地调查报告式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的升级困境,忽视社会理论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竞相像谈论时髦明星那样把社会理论大师挂在嘴边,或者置于文章注释中作为点缀,那也不过是学术泡沫现象的泛起,恰恰从另一侧面表现出社会想象力的枯竭,与真正的学术建设和品质提升了无干系。

要克服社会学表面繁荣和背后危机四伏的症状,不仅需要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大功夫,而且要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扎扎实实的基础建设工作,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能为这一建基性工作增添些许砖瓦,作出绵薄的贡献。

苏国勋

于 2005 年岁末

西云齋藏書

藥藥孕燥地燥地燥藥月更藥熱熱藥藥藥藥

■ ■ ■ 當鐵士當奈藥房出現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支持和资助。

韵良嗣有藥赤遣豈多福曹蒙林樾樾明峯豈怎酒逢豈柳葉安林韻留豈案李建劉解
何廉占柳曉暖

目摇摇录

引言	
1954年 8月的后记	
第一部分 摇巴黎会计事务所的案例	
摇猿■ 组织概况及其成员与各自任务的匹配	
摇圆■ 人际关系和群体间关系以及常规问题	
第二部分 摇联合工业垄断企业的案例	
摇猿■ 车间社会体系,工人群体规范和权威关系问题	
摇源■ 车间社会体系,职业类别间的关系和各职业类别特有的行为方式	
摇缘■ 领导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三部分 摇从组织理论的观点看科层现象	
摇远■ 权力关系与不确定的状态	
摇苑■ 科层组织体系	
第四部分 摇作为法国文化现象的科层现象	
摇愿■ 法国科层体系的模式	

法国社会体系中科层特征的重要性	怨
资产阶级与科层组织	愿
结论科层现象与在工业社会总变化中的法国模式	
参考书目注释	

引摇摇言

从我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的那个时刻起,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中,学术氛围、政治氛围和集体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我的论题并未失去丝毫的现实性,而是完全相反。人们从不曾像现在这样抱怨科层属员的愚蠢或蛮横,也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对科层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比如人们表现出对参与的需要,并表现出对过于沉重的集体纪律压迫的反感。

人们在 1960 年代初对这些问题可能会给予的理智关注现已变成了焦虑、魔怔,乃至躁动。

我原想驱散的科层神话现已转化为噩梦。人们开始有了这样的印象:即使是(或者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公众所寻求的,也不是一种分析,而是一些驱魔之法。这些驱魔法,对于最激进的人来说是自我管理,对于最保守的人来说是直接参与。

在此背景下重读我的这部著作,我发现它在现实性的表象下,仍像当初一样是那么地反潮流。

1970 年,我的研究令人大为震惊,因为这些研究迫使人们看到他们拒绝看到的东西:当人们必须将人类组成的组织作为手段加以使用时,这种必要性便造成了一切行动的压制。人们认为我的研究是悲观主义的,是非人道的,是反理想主义的。

1949年，人们发现我的研究更应该说是乐观主义的……他们明白了，一切组织机构都是压迫性的，都是可憎的。他们已无心再纠缠于分析和判明这些组织机构可以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构成对人类自由的障碍。他们只对结论感兴趣。而我的结论现在看来至为简单，几近幼稚。这些结论并不是怨天，而是尤人。

我的立场是可维护的吗？现在人们能够拒绝接受那些与我们所发现的众多相互依存的关系似乎如此相符的全部答案吗？人们能够规避一切都串通起来迫使我们必须作出的那些对重大价值的选择吗？

我认为是能够的。在 1949年，有这样一种认识：善和进步可以是绝对价值，只须将它们加以明确和肯定就足够了。就像当时摈弃这种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今后消除革命梦想和左派实践似乎是当务之急。按照这种梦想和实践，灾难性矛盾的连续发生会造成全面的转变。老实说，在这两种本是如此矛盾的态度中，我发现了某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对压制的无知，对人类的笨重这一现实的不能理解和对决定论的过于简单化的认识。

肯尼迪时代的自由党人和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理智的正确运用来掌握人类的命运。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是强烈反理性的，但这是以一种更为幼稚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名义，是出自对另一种理智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效率的信念。人们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将这个深深陷入非理性或疯狂的世界分为实际存在与上帝的王国两个方面。而人们只注重上帝的王国，在这里，意志可以无拘无束地得到发挥。

但是上帝的王国既不属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也不属于我们

明天的世界。一言以蔽之,它从不属于也永远不属于我们的这个世界。相对我们限制很多的组织机构和残缺不全的价值所构成的压制而言,我们自然可以向往更多的自由,但这只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暂且抛开污染和科层不论,我们必须接受并承认,我们明天可能的自由建筑在我们对今天自由的承认与认识上。

我们所承认的这种自由虽然大大地缩小了我们乌托邦的自由,但是较之我们只能在内心里使用的自由,它毕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实现切实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尚无力克服的压制的真实力量,看到我们为摆脱压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过于轻易地将我们的困难归咎于诸如进步、技术、科层这类貌似可怕的抽象事物。有错的不是技术或组织形式。有错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策划的人。我们抱有希望的理由和为变化而战斗的一切合法性正是出于此。虽然人是有错的,但是他们可以学会改变自己,也值得对他们加以说服。也许我还可以大胆地补充这样一种大不敬的想法:道德的反叛,即青年一代沉迷于一时的那些激烈的攻讦和莫名其妙的狂热,在当前构成了科层倒退的最大可能。

读者会问,你凭什么如此自信呢?现在无论最激进的人还是最因循守旧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我们的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文明发出悲鸣,而你却提出了一种与此背道而驰的预期理由〔员〕,你掌握了何种明确的事实支持这种预期理由呢?

我当然没有明确的事实。我所依据的,不是一种学术性的

〔员〕 预期理由,逻辑学术语,指用未经证明的论据论证论题真实性的逻辑错误。——译者注。

公设或一种价值的选择,而是对‘科层异化’的最敏感点进行直接分析实验的结果,以及在我被迫与矛盾的接触中逐渐在内心形成并不断得到证实的信念。神话会随着对它的研究而消失。抱怨和思想与人们进行的真实游戏只有一种装饰性的外表关系;在滔滔不绝的论述的表面逻辑背后,有一种更深层的逻辑,我们可以对这种逻辑进行积极的认识。通过这种积极的认识可以得出更有效的解释:何以一个人类体系具有科层的特征,而我们一方面在攻击这些特征,一方面又通过攻击方式本身在为加强这些特征做着贡献。

我写《科层现象》,就是本能地想让人们了解我的这种信念和我获得这种信念所进行的研究。当然,我必须以更科学的方式描述科层的特点和弊端,认识科层的机制,提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但是或许在我内心的更深处,我所追求的,是让读者感觉到,我们每个人所痛苦地切身体会到的、惟恐弃之不及和咒之不狠的那些非理性的弊端,其实是自然的、合理的、相对单纯的、可以积极认识的现象,因此也是能够加以干预和改变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如此之多的篇幅——约全书的三分之一,陈述了我选作起点的两次调查结果并详细介绍了我的分析过程。

本书初版时有些读者对我的这种做法颇感惊奇。乔治·比尔多说,难道社会学家就非得赶赶时髦,让人看到他的两脚沾满了工地上的泥巴吗?回过头来看,我当时似乎就是想这样做的,现在仍想这样做。只有通过亲身体验的实地学习,才能发现一种新的科学推理的意义,才能学会更加自由地研究那些令我们纠缠不清的重大问题。

请大家放心,展开、分析、科学推论,并不就意味着令人厌烦的方法论。这里将谈到两个具体案例,即两个故事。故事讲述

的是人们如何徒劳无益地寻找罪人,直到他们学会了根据关系而非个人、根据体系而非偶然的对抗来进行推理。总之,这是一部倒插笔的侦探小说,它从罪人出发,展现出案发的环境和情景。

但是社会学家不能停留在侦探小说上。他之所以孜孜不倦的科学态度坚持肯定一种方向性实验方法的价值——这种方法就像十年前曾引起上一代人的愤怒一样,正在引起年轻一代的不耐烦——并不是他想让人们根据他的方法和职业道德对他作出评价。努力的价值并不以付出的辛劳来衡量,而是以取得的成绩来衡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取得成绩,就是能从这些研究中剔除那些无益的理论。

我从对深受科层弊端影响的组织的调查中所得出的理论,需要予以某种论证。我将尽力将这些评论写得明确而生动,以促使读者以更大的热情阅读,

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保守派,无论是詹姆斯·伯纳姆还是罗莎·卢森堡,^{〔1〕}无论是马尔库塞^{〔2〕}还是加尔布雷特,他们对科层的传统看法莫不如此。科层是生产单位集中的产物,而这种集中则是由于技术的制约和新的经济规模所造成。越来越受到等级的和强制性的科层机器所控制的现代组织的军团化、因循守旧皆由此而产生。

通过对切实具有科层特征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我觉

〔1〕 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生于波兰。——译者注

〔2〕 马尔库塞(1898—1969),现代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它阻碍了我们看到真相。

虽然马克斯·韦伯〔员〕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虽然人们对卓有成效的普鲁士科层传统过分本能的尊重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想的确立，就效率而言，制度化和科层的等级模式具有绝对优越性，可是对事实的分析证明，这种模式越占上风，组织的效率便越低下。

事实上，广大公众心目中的科层（即人们所抱怨的因循守旧、僵硬、强制、不负责任等组织特征），绝不是未来形象的雏形，它并没有那种随着企业的集中而特别增长的倾向，〔圆〕它只是那个对人际合作手段抱有狭隘观念的过去年代所留下的一个残破遗物。

其实任何一个组织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像机器一样运转。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由组织所构成的人的总体理性地协调其活动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技术的发展，但也取决于而且有时尤其取决于人们能够以何种方式进行他们之间的合作游戏。

这样一种游戏并不是一种和谐的游戏。它既可以被视为冲突的游戏，也可以被视为合作的游戏。实验分析表明，它受到权力问题的决定性影响，这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和多少有些神秘主义的权力，那种处于高峰并有朝一日终可抓住的实体，而是那些权力关系，那些为了确定谁赢谁输、谁吸引谁、谁影响谁、谁从属于谁、谁操纵谁并达到何种程度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们将看到，我的社会学调查所显示的是 在与他人的关系

〔员〕 韦伯（~~配~~ ~~著~~ ~~宰~~ ~~漢~~ ~~則~~ ~~元~~ ~~力~~ ~~源~~ ~~一~~ ~~員~~ ~~恩~~ ~~恩~~），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圆〕 就像现在法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只有当人们在新的集中中采用了不适用的管理以前那种小组织的模式时，科层才有所增长。

中,每个个人的权力都取决于他的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取决于他对关系到目标实现与否的那些不确定因素的根源所能进行的控制。正是由此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倾向:使自己变得不可缺少,保守特殊安排的秘密,保持构成其权力存在理由的那些不确定的、不容他人染指的、甚至非理性的东西。也正是由此产生了为提高个人身价而不惜损害整个组织的那些个人间、团体间的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

由于这些原因,一个组织不单纯是由完善的科层机器规定的权力与义务所构成,更不是由老板或技术结构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劳动力对剥削的反抗所构成。组织是由一些相互冲突、相互依存的游戏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通过这些游戏,掌握着往往各不相同的王牌的个人,遵照环境所确立的不成文的规则,充分利用自己的一切优势,拼命削减他人的优势,以求最大限度地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游戏是非常不均衡的,但是从游戏者各自的角度去看,任何游戏者都没有完全失去机会。不均衡主要存在于游戏之间,而不是游戏内部。整体只是靠分裂和大量的暗地活动才得以立足。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倾向:虽经领导者的不懈努力,沟通的障碍却仍在扩大、保持或重新树立。正是由此产生了因循守旧和呆板僵硬。也正是由此产生了那些表面最理性的组织的低效率。

但是某些组织更有效率,我们可以非常笼统地说,现代组织——除了临时发生混乱和有倒退倾向外——正渐渐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已经远比五十年前的组织更有效率。为什么?因为这些组织有意识无意识地制定出一些游戏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当参与者在继续理所当然地追求自身利益时,进行沟通对他们大有益处。这不是消除基层的权力关系——这是徒劳的,而是

承认这些关系,以便能够调整这些关系并迫使合作伙伴进行直接谈判,也就是进行沟通。

但是,这样的一些游戏要求人际关系更加明朗,更加直接,而事实上这样的人际关系对参与者来说要可怕得多。对于所有关于权力分散乃至自我管理的经验的研究,都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权力分散或自我管理在受益者(或受害者)中间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心理压力。

若想有切实的变化,若想让科层消亡或者至少得到削弱,人就必须获得新的能力:面对压力的个人能力,组织和维持那些更多建立在交流上而较少建立在防范上的游戏的集体能力。

这里牵涉到文化的维度。由家庭模式、社会化模式、教育模式等传播并经社会生活经验不断强化的一个国家社会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这些能力的可能发展。国家社会的特征构成了对一切变化极为强大的制约。

《科层现象》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谈的便是文化维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一部分是一种解释性的评论,不是一种分析,也不是一种理论。

在探讨我的两个案例时,我已衡量出这种文化背景的重要性。通过组织的理性理论的发展——我刚刚概括了这种理论的几个要素,我观察到一些现象,我完全可以对这些现象作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但是我注意到,当我将一种法国文化模式的抗拒力介入其中时,同样的现象便可以作出迥然不同(但并非矛盾)的解释。因此我想从头做起,看一看用不同的推理方式能够得出些什么,并力图使两种研究方式互为补充,以求确立一些更普遍的理论要素。

对理论思辨不大感兴趣的读者,在第三部分尤其将看到对

当今法国社会、其组织模式及其行动风格的一些非常直接、至少在当时显得颇为冒犯的想法。我们对面对面接触的本能的恐惧反应,对权威的绝对主义观念和对任何微小从属关系的厌恶,这一切所产生的问题,法国特色的科层是解决它们的最合理的方法。

毋庸强调,这样一种模式从今以后处在了危机的状态,这一危机正触及整个法国社会。人们将在这最后一部分看到对这一危机的诊断要点和关于法国社会变化的可能性的探讨。

从我写此书的那个时刻起,事件的发展比我所预料的还要快,追上了分析者,甚至走到了前面。我当然认为,我在 1945 年所写的这些看法,并无改变只言片语之必要。如果有的读者对我这些过于匆忙的、带有那个更为乐观的时代的幻想印记的结论感到不甚满意,他可以在《被封锁的社会》中看到他所期待的诊断,关于事件带给他的确认和否认所做的社会学的探讨。

灵缘年 灵月的后记

时代风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一本书、哪怕是一本科学著作的解读。在灵缘年，我曾感到非常奇怪，《科层现象》这部在初版时曾被看作反对灵通年代高奏凯歌的专家治理论者的战斗作品，居然会被视为一部反对以自我管理求得解放的幻想、维护组织文明的辩护书。又过去了灵缘年，风向还是转得那么厉害，以至于在这个不分左右翼全被扫得人仰马翻的现代化风潮中，如果我应该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担心自己被淹没在这股反国家干涉主义的潮流中。

有人会对我说，我终于被人理解，我应该为此感到某种宽慰了。不管怎么说，这是自认为先驱者的人成功的最好证明。如果他想继续品味前卫者辛酸的乐趣，那就该突破第一本书的限制。幸而，或者说不幸，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与《科层现象》告别。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会改变成功的形象、对世界的看法和政治用语。一旦将新的‘社会方案’落实到行动上时，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便不可避免地又转化为另一些‘必须’。人们不能消除与我们集体生活息息相关问题，就像注定不能除掉不吉利的内萨斯的袍子〔灵一

〔灵〕 内萨斯的袍子，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内萨斯企图拐骗赫克里斯的妻子，被赫克里斯的毒箭射中。死前内萨斯骗赫克里斯的妻子说，赫克里斯穿上他那件沾上血污的袍子即可保持对她的爱情。她将袍子送给赫克里斯穿，他因此身亡。内萨斯的袍子喻致人死命的不吉利的礼物。——译者注

样。人们不能规定自由主义，人们是在争取自由主义，人们是在孜孜不倦地一砖一瓦地构筑自由主义。要达到自由主义，首先应该搞清楚，在观念学者抱着郴放的表象的背后，在更深层的地方，与自由主义相关的究竟是些什么？

在我所选择和分析的两个科层案例中，人们将发现可以使

我们走得更远的推理方法和方式。人们只有在分析和认识上走得更远，才能对更快而更有效、或者说更人道的演变有所贡献，这与所有政治家和所谓活动家所想的恰恰相反。再没有什么比按照社会原则、规划和计划的行动更不切实际的了。人们切身感受的问题是不能用那些简单而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的。对这些问题需要格外当心，格外谨慎，需要进行人们往往拒绝进行的认识。再没有什么比建立在认识基础之上的行动更切实际的了。当事关物质材料和物理过程时，人们认为花费巨资加以研究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事关最宝贵的材料——人类材料和最微妙的过程——人类相互关系的过程时，人们却拒绝研究其他的管理原则，只知道采用简单得堪与燃素说〔1〕相媲美的那些原则。

然而，1850年的法国已经成熟到可以发生真正变化的程度了。决策机制、集体行动程序和方法、国家体系，虽说都还依然陈旧不堪，但是法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已使他们如此完全内心化的科层作风的存在。就像一切真正变化的时代一样，人走在了前面，体系落在了后面。

在这个极为有利的时代，我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革新给了我们机会。但是，如果不想毁掉这些机会，就得学会认识。

〔1〕 燃素说，有关燃素的理论。旧时人们认为可燃物中含有燃素。——译者